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传递外交新转向信号

从韬光养晦到积极作为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海外权益保护需要公共外交发力

据12月4日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与印度联合投资的叙利亚代尔祖尔油田落入“伊斯兰国”武装的手中,沦为美国为首的盟国空中打击的重要目标。

代尔祖尔油田是一个并不为国人熟知的名字。

2005年,加拿大石油公司出于对叙利亚政治风险把控担忧的考虑,决定出售代尔祖尔油田38%的股份,中石油和印度石油公司联手竞标,3年后,中石油又与叙利亚石油公司签署改造代尔祖尔炼油厂的协议。

2011年,叙利亚政治危机爆发,中石油公司损失惨重,直到2013年4月该地区油田完全落入“伊斯兰国”武装手中。

就在几天前,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将超过1200亿美元,有望第一次超过吸引外资的总量,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分水岭。

12月6日,刚刚陪同马来西亚副总理和前总统出席活动,参加完世界华人经济论坛的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中国境外投资很快就会超过2000亿美元,如何保护海外权益成为问题,“代尔祖尔油田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企业投资要时刻研究政局动向,对变动做出必要前瞻。”

闫立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亚中心主任,中国海外利益研保中心主任。就在12月2日接受齐鲁晚报采访前,闫立金刚刚出席了11月28日到11月29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在讲话最后强调的“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权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让闫立金非常兴奋。

中国海外权益受损已经不是话题。2011年2月,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战争造成中国在利比亚200亿美元的投资被搁置,原油合同被迫停止供应,损失惨重。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们构建海外权益保护体系还只是第一步。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的说法是第一次提出,也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微妙转变。”

当然,这也是发展的需要。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累计海外企业数量有望达到3万—5万家。此外,我国海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等都有加强。但遗憾的是,我国并未构建成熟的海外权益保护体系。

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中国海外利益研保中心也在构建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来应对这些,也就是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

但这远远不够。闫立金认为,在海外权益保护中,除了政府主导,还有其他层面加强,就是如公共外交。要进行文化力量保护、经济影响力保护、法律力量保护等。如法律力量保护,要培养熟悉当地的法律人才,规避一些风险。在哥伦比亚,有关法律禁止与恐怖组织或反政府武装私了绑架或类似案件。

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外交资源是非常珍贵的,不能滥用,很多都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发挥作用,避免某些国家层面的推动引起他国不满。因此,如何发挥民间力量,是海外权益保护的重要一环。”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和水平只是展现中国外交积极作为的一个方面,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所展现的,是中国外交全方位转变。闫立金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全方位转变。

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一背后是中国日益依赖世界、世界日益依赖中国的环境的变化。有20多年海外经贸与外交工作经验的闫立金的亲身经历,正说明这种变化。

1986年,闫立金前往泰国工作,与当地商人打交道中,他发现中国人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当时泰国一些民众叫我们乞丐,因为很穷,瞧不起我们。”一位华侨对闫立金非常热情,经常



闫立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闫立金最近很忙。几天前,他刚刚参加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亚中心主任、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闫立金对这次会议感到兴奋。

时隔8年后再次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闫立金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全方位转变,从韬光养晦向积极作为方向转变,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转向。这种变化背后,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大国角色的需要,是中国日益依赖世界、世界日益依赖中国的变化。



在法国一处被中国企业收购的酒庄,工人们正在劳作。中国企业海外权益保护,需要政府主导。

将自己的一些衣服赠送给闫立金。“那位华侨将泰国人介绍给我,主动教我做生意,还主动购买中国产的家电,并向其他人推荐。就这样,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泰国也越来越重要,“乞丐”不再成为泰国对中国人的称呼。

据统计,2012年,中泰双边贸易额接近700亿美元。中国是泰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旅游客源国,泰国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二大贸易伙伴。

“现在那位华侨经常问我,中国经济为何发展如此快?就像中国与泰国的关系,中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方向经历很多变化,各有不同侧重点。改革开放前强调民族独立,改革开放后侧重韬光养晦,为中国赢取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但中国与世界关系如此紧密,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所以中国外交需要转变。”闫立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转变就已经出现,如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将韬光养晦转变为正常化,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国外很常见,这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去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东

南亚进行一系列密集访问,就说明了这些。2013年10月,习近平对印尼、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克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等。

“就像中国宣称的那样,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让他们搭乘中国发展的成果。”闫立金认为,今年APEC领导人峰会和G20峰会上,中国又展现了积极作为的外交。如去年主动提出的与其他国家搭建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提议得到落实。

坚持道义有时要舍弃利益

在闫立金看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还提出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弘义融利是新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过去,我们对非洲和其他地区国家进行无偿援助,只讲义,基本不讲经济利益,那是因为我们国家穷,经济不行,对外接触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和对外投资都非常多,所以现在要弘义融利。”目前,闫立金还担任着巴基斯坦总统顾问,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我们首先还是要坚持道义,有时甚至舍利重义。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也讲到加大战略投入,战略投入很多都是长时间积累的。比如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只有巴基斯坦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汶川地震中,这种友谊表现得非常明显,巴基斯坦捐助中国的帐篷达到22260顶,是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

11月14日至23日,习近平应邀赴布里斯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

访问斐济,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斐济,习近平同8个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谈会见,并同他们举行集体会晤,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合作。

“与这些国家打交道,不能只看重利,因为他们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上,会发挥一定作用,这就属于战略投入。习主席此次太平洋之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时期外交全球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闫立金对齐鲁晚报记者表示,“虽然我们的外交方向发生全方位转变,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我们区别于西方某些国家的地方。”

近期流传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是民间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国家战略海外投资的说法。“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

针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称呼,闫立金觉得不合适。

“尽管‘一带一路’能像马歇尔计划一样,促进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但并不像马歇尔计划要求对方国家站在我们这一边,甚至结盟或打着类似人权等幌子。我们是在不结盟条件下,广交朋友并且不干涉其内政。如同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伟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上接B01)

与既得利益者的“拔河”

戒烟运动在台湾其实已经有10年以上的倡导,但直到1997年才实现“立法”,并管制烟商的行为。背后的阻碍之大显而易见。

“立法”管制对烟商来说是高成本的伤害,何况台湾当时还有公营的烟酒专卖局,光自制香烟及进口烟贴标,对台湾经济发展及财源都是极大的扼杀。

因此,一部要管制烟商的“立法”,就得和烟商等既得利益者及资本家进行“拔河”。

如同台湾禁烟紧盯利益集团一样,12月2日,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主办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讨论会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桂华对该条例能否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而顺利通过表示高度关注。

2012年,《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明确提出,“按照‘抑制烟草生产供应,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总体要求,严格烟草税收征管,确保烟草企业依法按时足额纳税”。

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保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控烟履约是一个长期过程。”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官方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生产卷烟2593.8万箱,同比增长0.2%;销售卷烟2664.7万箱,与上年同期持平。2013年,全国生产卷烟5067.5万箱,增长1.7%,比前10年的平均水平减少2.06个百分点;销售卷烟4999.6万箱,增长1.2%,比前10年的平均水平减少2.32个百分点。

“实际上,每年公司都会给我们增加销售任务。”临沂市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齐鲁晚报记者坦言,“虽然烟草是专卖,但在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增加销售任务对我们基层来说也很难,一切都是为了多营收、多交税。”

1982年,国家开始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体制,至2013年,全国烟草税收年均增速高达18.4%。2014年上半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5795.4亿元,同比增长9.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沈敏荣认为,虽然《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早在2006年1月9日在我国生效,但目前履约现状与其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如目前没有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未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公众对于吸烟危害的认识仍然有待提高。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在生效后5年内做到室内100%无烟,也就是在2011年11月9日前全国性的无烟立法就应出台实施,但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整个履约机制陷入停顿,其根本症结是公约履约机制中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总公司政企不分。”沈敏荣说。

台湾如今的禁烟经验给了大陆有所借鉴的机会。台湾的烟害防治就是在民间挑起民众自觉意识,加上政府硬性的公权力两者配合之下,走过了禁烟、防烟害的文明之路。

目前,中国已有哈尔滨、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十四个城市颁发了地方性公共场所控烟法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在今年11月28日通过,规定室内场所全面禁烟,国家立法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对城市控烟执法调研的结果发现,室内场所全面禁烟没有增加执法的难度,而部分禁烟恰恰会增加控烟执法的复杂性和难度,会影响法规的有效实施。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研究员杨杰则建议,下一步应做好广泛动员,“保证各级政府给予应有的重视,简化执法程序,加大控烟执法的投入,通过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研究探讨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建设。”

然而,对于不愿被二手烟呛到的王怡佳来说,她需要学会如何让抽烟的人尊重自己。

站在电梯里,王怡佳再次询问吸烟的中年男子,说:“您好,请问能不能先把烟掐灭?”

尽管王怡佳说话的声音不如起初高,中年男子也没有回头,却悄悄把烟掐灭了。